

比较文学史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吉顺庚主编

比较文学史

曹顺庆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舒平
封面设计：魏天禄
技术设计：何华

比较文学史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曹顺庆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3.25 插页2 字数520千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1118-0/I·134 印数：1—455

定价：10.80元

本书撰写者（以章节顺序排列）

李达三	曹顺庆	刘以焕	段 炼
叶舒宪	乔德文	茅于美	应锦襄
林亚光	陈厚诚	伍晓明	王 宁
刘象愚	张世君	伍厚恺	余维钦
钱林森	张连奎	杨武能	覃 红
谢天振	刘亚丁	陈建华	赵炎秋
曾庆富	汪洪章	丰华瞻	姚秉彦
易明善	郁龙余	仲跻昆	何乃英
孟昭毅	陈 倒	王晓平	朱 徽
肖 黎			

序

〔美〕约翰 J. 迪尼（李达三）

我很荣幸地应曹顺庆先生的邀请，为这一部内容深广、人们十分需要的著作写一篇序言。我的这篇序言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观点写成，但我还是希望文中的论点能够按我的初衷得到人们的理解，那就是，能够激发思维并引起讨论。

对我这篇序言将要阐述的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大学生最近的一封来信作了总结概括，尽管这封信的本意也许并不在此。这封信写道：“开始，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爱因斯坦似的科学家，因为我的自然科学课程学得很不错。在大学时，我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并开始对我的生活目标重新进行了思考。我为我读过的一些作品深受感动，进而对将我们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产生了兴趣，就这样，我转向攻读文学。我意识到，中国现在最为缺乏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对其他民族的内心审视。我的许多同胞对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

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去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尖端技术和舒适生活，他们的内心审视变得越来越空虚。我热爱我的祖国——中国，所以我要更多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介绍给中国。”

这部著作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怎样形成了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并发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它表明了各种各样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为中国今后将对这一领域作出的贡献提供了依据和环境。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在中国发轫，还只是几十年前的事。然而，这门学科却经历了令人惊异的飞速发展，它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在此之前受到称赞的人文科学领域内任何一门学科都更为深刻。为什么中国在现代化上付出的努力是重在改进生产手段等方面，这很容易理解；尽管如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对结果进行审视，以及通过文学表现对选择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所具有的重要性。将中国比较文学从一般性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区分出来的，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即影响-翻译、时期/运动、文类/风格、题材/主题以及科际整合等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论体系，从中国观点出发，对外国作品（当然也包括各自的价值体系）的相似与相异进行明晰的审视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宽松气氛中，出现了急速增多的新书籍和新杂志，这里面既有中国作品，也有翻译的外国作品。这一门相对来说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发展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世界比较文学史中，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都是空前

未有的。所以，在下面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背景之后，我要对这种飞速发展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复杂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一些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试图在盲目死守中国传统和全盘吸收外国东西这两个极端之间走“中间道路”。以比较的方式研究文学，就使得致力于此的人们付出努力，在中国特色和外国成份之间实现一种恰当的平衡。

80年代初期，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对这种研究给予了支持，使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得到保证，这样，比较文学在这些大学和中心里就取得学科的地位。现在，它的根基已经牢实，其飞速的发展成长已经遍及整个中国。在全国组织举行了许多次初步的讨论会后，198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出版物方面，80年代产生了中文的^① 和英文的^② 比较文学刊物。据1987年3月12日上海《文学报》报导，在过去几年里，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发表了两千多篇论文，出版了60多种著作！

中国如果没有大量地向他人学习，也就不会开始它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坦然承认，他们从别的比较文学工作者，尤其从台湾和香港的学者那里获益匪浅，有许多重要的借鉴。事实上，正是台湾的比较文学工作者从70年代初期开始，就以他们的比较文学学会及其年会，国立台湾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硕士学位项目等，将中国文学切实地纳入了比较文学的范围。1989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在研究生项目中新增设了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出版物方面也出现了一派兴旺之势，除书籍之

^①《中国比较文学》（上海外国语学院）

^②《文贝》（桂林，漓江出版社）

外，从70年代初开始，还出版了一些中文和英文的刊物^①。但是，看来大陆并不只是想步台湾比较文学工作者的后尘，即将西方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运用于中国文学。

任何一种学术活动，只要象比较文学这10年的成就那样引起广泛注意，其影响就必然超越这门学科的范围。这里的要点是，中国怎样认识自身和自身的文化，中国怎样对待别的民族，以及其他民族怎样对待中国等，采用比较的方法，就能够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进行重要的、深入的探索。

当然，比较文学是在其跨文化的探索中去寻求相似与相异之处。寻求中西文学间的相似之处（如：是个人自由，还是社会协调），其意义之一就在于，有一些普遍的观念是人类共有的，而绝非为某一个民族专有。回想这样的“普遍”现象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它有助于调和导致产生沙文主义温和派观点的趋向，而无论这些观点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过，发现差异的时候，如果将文学与文化作一番对照，比较的方法就显得更为恰当适宜。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愿对差异之处进行思索探究，而学习新东西也总比仅仅知道别人指出的共同点更能激发我们的积极性。简言之，无论一个人的专业是什么，他的祖国在那里，那种对差异有意识的正视与探索都会培养起他胸襟开阔、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会使他对在自己所属文化中的身份地位作一番分析和检验，还会使他通过与外界的接触，进一步振兴和丰富自己的本土文化，并在国际交往中增进互相理解（或者起码是有助于避免误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初期（台湾亦是如此），经常出现“这就使我想起某一点

^①如《中外文学月刊》（国立台湾大学）、《淡江评论》（淡江大学）等。

来”之类的情况，这是一种零碎而肤浅、为比较而比较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受到杰出学者钱钟书的严厉批评，因为它忘记了应当对迥异的文化背景加以考虑。即使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作家或作品从甲种文化中接受的影响放在乙种文化中进行分析），如果不从来源和目标两个方面去考虑各自的背景，也不可能运用得很恰当。真正被目标文化吸收的成分有多少？吸收的成分与来源本身的成分相似的程度有多大？艺术特征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吗？这中间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等等。如果对上述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其结果就会像某个中国企业家，他试图去模仿西方的技术或管理方法，可是对这些技术或方法的基本原则却一窍不通。

中国人应当怎样对“外国专家”（包括文艺理论家）为中国提供的东西加以控制并最终消化吸收，而又不至于丧失他们自己的民族地位和民族观念呢？令人遗憾的是，眼下对这个问题的预测并没有太大的希望。例如就比较诗学而言，看来以中国方式运用西方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之少。事实上正好相反。如果对上述那些外来成份的介入听之任之、不加批评，那么，对“中国特色”的阐释和界定必将被继续拖延下去，变得含混不清。幸运的是，这种前景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有一种运动对上述种种趋向在进行反拨。这种与众不同的运动被称作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这个名称是由我十多年前首创的，当时试图对过分强调所谓“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作出相应的反应。^①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名称在政治上并不恰当，或者甚

^① 见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第2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

来”之类的情况，这是一种零碎而肤浅、为比较而比较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受到杰出学者钱钟书的严厉批评，因为它忘记了应当对迥异的文化背景加以考虑。即使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将作家或作品从甲种文化中接受的影响放在乙种文化中进行分析），如果不从来源和目标两个方面去考虑各自的背景，也不可能运用得很恰当。真正被目标文化吸收的成分有多少？吸收的成分与来源本身的成分相似的程度有多大？艺术特征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吗？这中间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等等。如果对上述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其结果就会像某个中国企业家，他试图去模仿西方的技术或管理方法，可是对这些技术或方法的基本原则却一窍不通。

中国人应当怎样对“外国专家”（包括文艺理论家）为中国提供的东西加以控制并最终消化吸收，而又不至于丧失他们自己的民族地位和民族观念呢？令人遗憾的是，眼下对这个问题的预测并没有太大的希望。例如就比较诗学而言，看来以中国方式运用西方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之少。事实上正好相反。如果对上述那些外来成份的介入听之任之、不加批评，那么，对“中国特色”的阐释和界定必将被继续拖延下去，变得含混不清。幸运的是，这种前景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有一种运动对上述种种趋向在进行反拨。这种与众不同的运动被称作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这个名称是由我十多年前首创的，当时试图对过分强调所谓“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作出相应的反应。^①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名称在政治上并不恰当，或者甚

^① 见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第2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

绪论：走向世界文学

- 比较文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曹顺庆

题记：

我们需要国别文学，也需要总体文学；既需要文学史，也需要文艺评论；我们需要只有比较文学才能达到的广阔视野。

——雷内·威勒克

自歌德于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起，比较文学便由隐至显，一百多年来，它已从一株幼苗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

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漫漫求索途中就一帆风顺，恰恰相反，自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出版迄今，比较文学始终“危机”四伏。无论是早期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批评与责难，还是本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威勒克的“危

机”论，乃至中国近年关于“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的论争，都显示着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危机。时至今日，学者们仍不能给比较文学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例如，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法国人基亚在他的《比较文学》一书问世26年之后，仍然在该书第六版序言中慨叹道：“企图对它的性质下一个严格的规定可能是徒劳的。所以，我不再为它的理论问题多费笔墨。”现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托马斯·格林意味深长地说：比较文学“始终在等待一个最后的定义或描述，因为它的定义永远不可捉摸”。

面对着令人困惑的比较文学定义，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寻根问底地重新审视这一学科，《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威斯坦因于1984年发表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上的这篇论文的标题，也许正好说明了比较文学界的普遍困惑的心理以及重新寻求方向和归宿的企图。

究竟比较文学的归宿在哪里？在我们前瞻之前，还是先回顾一下比较文学定义的论争，以便确定“我们在哪里”。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学学科的特征究竟在什么地方？自然，不少人首先注意到了“比较”二字。无论是一国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或是一国与多国文学的比较；无论是专注于事实影响的分析，还是寻求无影响的类似，都离不开“比较”二字。难怪法国比较文学泰斗梵·第根认为：“‘比较’二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也有学者认为：“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的核心或基本方法。”然而，恰恰首先是“比较”二字，导致了比较文学定义的危机。克罗齐对于比较文学的否定，正是拿“比

较”二字开刀的。他认为，比较的方法并非比较文学所独有，它适用于各门学科，因此，“比较”并不能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石，“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专业的可能”。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威勒克也认为，“比较的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而是普遍应用于一切文学研究，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既然“比较”并非比较文学所独具，那么比较文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特征就不得不另觅它途，以便重新确定其特征。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不少学者赞成卡雷（Carré）的这一看法。认为比较文学的特征不仅在于比较，而更在于跨越国界，跨越语言界线和民族界线的比较。基亚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情感方面的彼此渗透。”美国雷马克提出的定义为不少学者所赞同，他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关系。”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亦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目前这种“跨越”说，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也并非没有反对者。因为在具体“跨越”的问题上，仍然有不少纠缠不清的问题。例如，所谓跨越“国家”与“民族”界线问题，是很难确定的，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家”与“民族”的界线是时常变化着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人的这一妙语，充分道出了“国家”的不稳定性。

“民族”的概念同样如此，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方为不同民族统治，以后则逐渐融合为一体。这种国家与民族的不稳定性，常常给我们的比较文学定义带来麻烦。例如，有人根据“跨越

国界”的定义，提出孔子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始祖”。因为孔子编辑的《诗三百》，包括了十五个国家（其国土不比现代欧洲的国家小），孔子将十五国风放在一起，以便比较观摩、研究和评论。还有人根据跨越“民族”界线的定义，认为中国初唐史家对南北文学的比较评论，可以说是地道的比较文学，因为当时南北朝由不同民族统治着。但就目前实际情况看，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同意以上的所谓“跨界”与“跨民族”为比较文学研究。如果因为这些“国”与“民族”已是历史陈迹而不予承认的话，那么当代的国家与民族的变动，又怎样处理呢？孟加拉国独立前与独立后的文学究竟有多大的差别？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与同时期的汉族作家的作品又有多大的民族区别呢？显然，这些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比较文学定义中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例如，在目前国内所出版的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跨越”问题互相抵牾的观点。有的教科书认为比较文学区别于民族文学的特征在于跨越“国家”界线，而“同一国家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比较，也只能属于民族文学的范围”。^①有的教科书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跨越民族的界线，而不是国家的界线。”^②因为“国界”主要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是同一民族的，也可以是多民族组成的。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文学之间除了它们统一的方面之外，也存在差异，有时这种差异的程度及意义，并不亚于两国文学之间的区别。因此“美国学者一再强调的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的论点，并

^①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第8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不是很精确的。比较文学原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① 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学生同时读到这两本教科书，一定会十分困惑，究竟相信那一本书的定义呢？

关于跨越语言界线，同样绕不开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目前在世界上，一个作家同时用两种甚至多种文字写作，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同用一种语言文字的现象也相当多。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乃至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都使用英语，如果将这些国家的文学加以比较研究，是否会因其不跨越语言界线而不能归入比较文学呢？显然不能！

另外，美国学派所提出的“跨学科”问题，也极不易自圆其说。雷马克指出：“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它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自然科学、宗教等等。”雷马克在这一定义中没有明确交代究竟跨学科研究是否也必须同时跨越国界。对这一问题，美国威斯坦因明确表示，文学与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必一定要跨越语言与民族的界线。^② 美国卡尔文·布朗在《音乐与文学》一书中也指出：“即便这样的研究不超越国家的界线，也被认为是比较文学。”^③ 如果文学与艺术的比较研究真的可以不必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界线的话，那么至少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历史就要推倒重来。因为诗与音乐、

^①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15页。

^② 威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译本第14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同上书，第148页。

绘画的关系，在不少民族早期文论中早已有论述，中国上古时期的《乐记》所论诗、乐、舞的统一，古罗马贺拉斯的“诗如画”，中国苏轼等人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论，都是地道的文学与艺术的比较，更不用说莱辛专论诗与画区别的著作《拉奥孔》了。如果将这些都划入比较文学研究，那么比较文学“古已有之”的说法绝对可以成立，而不必将比较文学的肇端定在19世纪了。显然，绝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能接受这一“现实”。

从以上极简略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感觉到，现有的各种比较文学定义不仅不容易自圆其说，而且还很混乱。自1958年威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迄今已有30年了，我们今天似乎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且借用威勒克的原话：“我们的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

让我们暂时离开概念的纠缠，去深入追寻造成这一长时期“危机”的根源。

比较文学自诞生至现在，为何危机不断？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圈子”，在于学者们为了“确定”这一学科，而误入了为比较而比较的怪圈。威勒克不愧是个明眼人，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他曾多次谈到造成比较文学危机的，正是这种我们称之为“圈子”的“人为的界线”。那些个“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以及“互不侵犯领土”的人为界线，正是造成“危机”的真正根源。因此威勒克指出：“比较文学只有在挣脱人为的桎梏，成

为文学的研究之后才能够繁荣起来。”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往后追溯，便会发现，自比较文学诞生迄今，整个比较文学的历史似乎由一个又一个圈子组成，而整个比较文学的发展正是一个个圈子的突破，或者说是一次又一次地挣脱了人为的桎梏而向前发展的。

事实上，初期的比较文学前辈们，提倡比较文学的宗旨在于打破文学中的闭关自守状况，提倡世界文学，他们大都眼界开阔，胸襟宽广。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的歌德，其胸怀是相当宽广的，他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主张“跳出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并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推出了专著《比较文学》，提出了较为宽容的标准：“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质上初步勾勒了后来确立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188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了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为该杂志确定了下述内容：一、翻译的艺术；二、文学形式和主题研究以及跨越民族界线的文学影响研究；三、思想史；四、政治史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五、文学与造型艺术，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六、民俗学研究。这些内容，不但涉及到影响与平行研究，而且还有所谓跨学科研究。早期的法国比较文学前辈如布吕纳季耶、戴克斯特、贝茨等人，其观点都是较为宽容的。

当比较文学进一步发展，“法国学派”诞生之时，学者们便开始背离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恢宏胸怀，逐步缩小包围圈，对比较文学加上了人为的限制，产生了第一个“圈子”。法国学